

价值焦虑：新时期以来
文学理论热点反思

盖 生 著

JIAZHI JIAOLÜ XINSHIQI YILAI
WENXUE LILUN REDIAN FANSI

上海三联书店

价值焦虑：新时期以来 文学理论热点反思

JIAZHI JIAOLÜ XINSHIQI YILAI

WENXUE LILUN REDIAN FANSI

盖 生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价值焦虑: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热点反思/盖生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5
ISBN 978-7-5426-2769-8

I. 价… II. 盖… III. 文学理论—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2789 号

价值焦虑: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热点反思

著 者 / 盖 生

责任编辑 / 杜 鹃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c@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20 千字

印 张 / 15

ISBN 978-7-5426-2769-8/G·907

定价:28.00 元

目 录

绪 论 何为热点,以何反思	1
第一章 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4
第一节 对文艺与政治关系讨论的价值盘点与意义反思 ...	4
第二节 讨论对创作影响及对应走势	8
第三节 文学的政治理性与政治约律	13
第四节 先进的政治理念:文学人文精神的重要纬度	17
一、政治伦理与人文精神	18
二、政治性与审美价值	21
三、当下文学写作政治神圣感的缺失	23
第二章 关于“文学是人学”命题的价值反思	28
第一节 关于文学的人学性质的讨论	28
一、第一次人学讨论的兴起与潜隐	29
二、对第三次人学讨论高潮的价值反思	33
三、人学的变体:对文学主体论的理性回眸	36
四、消费时代语境下的文学人文精神失落的寻思	43
五、现实主义理论本体化改造:人学文学理论建构的学理基础	49
六、重提文学的社会意义	54
第二节 文学理论的人学趋归:以价值论为哲学基础	62
一、人学文学理论与传统文学理论	63
二、传统文学理论的人学遗传基因及其变异	65
三、构建人学文学理论的可能	69
四、人学文学理论要以价值论为哲学基础	70

第三节	价值论:文学理论哲学基础的整合、提升之本	72
第四节	人学文学理论的落实与深化:人文现实主义理论的构建	76
	一、为什么人文现实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价值论?	77
	二、人文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现实依据	80
	三、人文现实主义理论与经典现实主义理论	83
第三章	关于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反思	87
小引	以什么为立足点进行反思	87
第一节	如何理解文学理论的“过剩”	87
	一、文学理论“过剩”是文学学科体制化的结果	88
	二、文学研究的学理化,必然导致理论“过剩”	89
	三、人文性是文学理论的基本价值之一	91
	四、如何理解文学理论的“过剩”	92
第二节	文学理论的效用危机与价值剩余	95
	一、对文学理论的效用的反思	95
	二、文学理论的有效范围	98
	三、文学理论的价值剩余	101
	四、文学理论研究的两种价值取向	103
第三节	文学理论的科学创新与健康发展	105
	一、什么是文学理论的创新	105
	二、文学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基本向度	107
	三、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与文学事业的整体和谐	111
第四章	迟到的争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吗?	113
小引	如何给文学定义	113
第一节	“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命题的理论语境	114
第二节	“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命题的提出的理论动机	117
第三节	争论的缘起	120
第四节	关于文学的定义	127

一、“审美意识形态”并不能涵示文学的本质	128
二、“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命题的理论后果	130
三、文学是语言艺术——一个命题的还原	131
第五章 “失语”与“转换”的价值焦虑	135
第一节 语境探析	135
第二节 “失语症”与“转换论”	137
第三节 怎样理解和进行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换	139
一、价值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逻辑关联	140
二、对古代文论研究价值的宏观评价	141
三、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价值之思	144
四、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定位	145
五、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147
第六章 对“文学终结”的焦虑与思考	150
第一节 由“终结”引起的焦虑	150
第二节 对“文学终结论”的思考	153
一、文学能否终结	154
二、文学为什么不会终结	157
三、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	160
第七章 全球化语境文艺学身份的焦虑	165
小 引 关于全球化文艺学身份的讨论	165
第一节 关于文艺学学科身份的危机	169
第二节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学科边界的讨论	178
第三节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关系的辨析	184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有什么关系	184
二、假文艺学之名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负面影响	188
三、“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联宗动机的深层追问	190

四、“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归属	192
第四节 对文化研究的价值反思	193
第五节 文化研究的价值定位	199
一、文化研究至多是文艺学研究的一个影响源和补充地， 而不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200
二、以文化研究替代文艺学的结果是给文学及文学研究 带来灾难而不是转机	203
三、文化研究其实是一种理论虚构	204
第六节 文化研究的学科归属与出路	206
第七节 对大众文化的思考	211
第八节 文化研究退潮与文艺学的新进展	217
一、是否需要和谁需要文化研究？	217
二、文学的文化研究退潮的历史必然	223
三、对文艺学研究的展望	224
结 语 失去热点后的沉思	229

绪论 何为热点, 以何反思

如果从 1977 年算起,新时期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是个什么概念? 它相当于整个现代文学史的时间。仅从文学理论讲,这三十年也是理论密度最大、更替频率最高、理论周期最短的时期。用各领风骚三五年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西学东渐,文学理论热点迭起,诸如形象思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主体性、文学研究方法论、文学研究向内转、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研究终结等问题,虽然讨论一波接一波,但大多匆匆而过,并没有在学理层面形成有效积累。本书意在从价值论的视野,通过对这些热点问题的反思和清理,整合其中的价值因素,使文学理论的发展拥有一个坚实的学理基础。

新时期初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现象:一方面是文学写作与政治的高度自觉结盟,另一方面,则在文学理论的言说上,力求挣脱政治的束缚。仿佛文学写作越与政治联合,理论家就越警惕、越自觉与之拉开距离,一时间,质疑文学为政治服务和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呼声越高。但是,文学到底是什么? 如果它不从属于政治,那么它以什么形态存在于社会? 依据是什么? 于是,在理论言说上,出现了两种倾向,一个是折衷性的理论命题的提出,即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一个是文学是作家主体生命的表达。这就是所谓的文学审美反映论和文学主体论。毫无疑问,这两个问题就是本书所要选择的热点。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在当时讨论得热烈,而是由于它们至今还是问题。例如前不久,还爆发了关于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争论,一方,是以董学文教授为代表的质疑、反对派,另一方,是以钱中文先生、童庆炳先生为首的维护、坚持派,他们都是学

界重量级的领军人物,说明这个问题的确还是问题。

相反,在当时讨论热烈,持续时间长的如关于形象思维问题,随着人们对文学特征认识的深入,已经成为定论或常识,虽然在某些细节上,至今还有人在阐释,却已经没有引起整个学界兴趣的问题空间了,所以,没有问题的当年热点,也就没有反思的必要,因此就不列入本书研究的范围。

另外,譬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年的讨论几乎是一面倒的,所以要还给文学以自由。因为建国以来,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政治对文学的束缚甚至压迫实在深重。理论界普遍意识到,虽然粉碎了“四人帮”,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给文学带来从来没有过的发展机遇,文学借助政治的鼓励尽情地控诉,政治得益于文学书写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极左政治。但是,文学与政治毕竟分属不同的领域,它们有不同的追求和取向,保持距离,相互尊重,才是文学与政治关系存在的理想状态。否则,文学与政治一旦在某些具体目标上不一致而失和,倒霉的还是文学。莫不如趁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尽早“分家另住”,“亲兄弟明算账”。应该说,这样的心理动机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下,不仅是理解的,而且也是明智的选择。

但是,应激状态的心理未必准确,而且在讨论中,学理的因素往往也没有占太大比重。在今天看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独立、分离就可以完全解决了的。事实证明,文学脱离政治的自为性写作,对于自身,其实也是一种消解和伤害。这说明,对新时期初期的热点反思,首先必须确定一个评价标准,即以确定对当下仍具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活着的问题,这才能够进入价值论研究的视野。

具体说来,从价值论视野研究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热点问题,就是从新时期初期“为文学正名”、“文学的主体性”,到中期的关于“文学的人文精神失落”,把它们与当下的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再认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命题等讨论结合起来,梳理出一条价值线索,既作为历史经验和规律的总结,也是对至今仍然有影响的价值因素的提取和弘扬。

由于新时期已经三十年,热点频仍,选择哪些问题作为价值反思的对象,还是颇犯踌躇的事。另外,什么问题有价值?价值标准是什么?也是不能回避的理论难题。本书无意作史,不是仅仅一般性地梳理和评判各个理论热点的挑起或制造者及参与者的功过是非,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和“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为基本的价值目标,确立文学理论的价值评价体系,以当下的实际的文学状况、理论状况、社会状况为评价依据,对新时期以来在热点中迸发的有生命、有影响理论命题、学术思想重新进行价值评判。力求既尊重各个热点发生的历史合理性,又兼顾到有益于当下和未来的文学理论发展。而对当年没有搞清的一些命题、概念逻辑关系等,诸如文学的主体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人文精神等问题,则需要重新界定和辨析,既提取出价值质素,又指出其语境局限,尤其是其中对今天有误导的因素。

举例说,主体论文学理论,曾经是新时期初期末最热门的理论,它的历史意义在于把文学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误用导致的机械反映论中解放出来,突出了作家的创造性,把文学活动看作是以情感为中介的审美表现活动。但从价值论视野,回溯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发展道路,就会发现,主体论文学理论,一方面,它仍然以主客二分模式把握文学活动,作家主体地位的提升,并不能圆满地解释文学活动中的一些情况,譬如创作中作者与对象交融一体,欣赏活动中物我同一的状况;另一方面,由于主体性理论把作家主体地位无限夸张甚至孤立起来,强调作者主体意识的同时,也鼓励了文学写作“向内转”,无视外在世界的自言自语。由于内心世界的空泛和虚幻不宜于长久书写,于是又下滑为“身体化写作”。在此意义上,主体论可以说是“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变异性理论源头。这类似的问题,正是本书所要重点研究的对象。

第一章 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第一节 对文艺与政治关系讨论的价值盘点与意义反思

毫无疑问,基于长期以来极左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政治对文学的影响,随着“四人帮”的粉碎,思想的解放和政治的逐渐解冻,文学理论界必然会首先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为这是文学能否获得创作自由、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所以,尽管文学创作领域正以空前的热情,自觉地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作:控诉极左政治,声讨“四人帮”,欢呼胜利,讴歌国家新生、民族新生、人民新生、文学新生,但理论家们并没有因此而溺没理智,他们在欢呼之余,仍然保持了应有的清醒。因为他们清楚,文学与政治毕竟不是同类,在社会结构中,它们分属不同的层次,有着不同的社会属性和功能,在具体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上,也各不相同至少是各有侧重。合作的蜜月也许是短暂的,文学的批判性是它与生俱来的品格,失去批判性的文学只能是玩物或花瓶。此前的教训太深刻了,文学依附于政治门下,仰人鼻息,处处讨好,还动辄得咎。必须趁政治清明、宽容,在理论上为文学争得属于自己的位置,即“为文艺正名”。于是,理论界开始对多年习以为常的非学理性的理论命题进行反思和质疑,这就是“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从属论”首先受到质疑的原因。

众所周知,最先对政治工具论提出疑义的,是1979年上海的《戏剧艺术》第1期发表了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因为是第一声音,文章仍然坚持多年的反映论,但能够对似乎已经是无可置疑的“工具论”提出疑义,也算是够大胆的了。上海不愧是惯领风气之先的城市,学界也较敏感,很快又有《上海

文学》1980年第4期发表了“本刊评论员”文章,明确以《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为题,直截了当地批评了长期以来的定论:“文艺从属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章发表后,由于没有招来以往的政治批判,说明至少得到了国家政治的默许,这无疑是一种鼓励。于是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参加讨论,表达意见。一时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成为理论界最热门的话题。

这次讨论,总的说来,是长期以来最具学术性的话语交汇,虽然在个别文章中,仍然残留着大批判的味道和痕迹,但大气候所致,基本上还是以理服人的。首先,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对政治概念的界定,以便为讨论提供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譬如,有人认为,传统上把政治仅仅归结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片面的,因此主张政治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革命是政治,建设也应该是政治,而且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建设可能是最大的政治。

还有人认为,政治是经济集中表现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变化而变化,因此不可能仅仅是阶级与阶级的斗争,而且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集中概括,所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物质和文化需求等,都属于政治的范畴。

对政治概念内涵的界定和外延的扩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政治的强力意蕴和暴力色彩。同时,也就淡化了其神秘和不可抗拒性,这样至少在心理上,可能减少作家和理论家因恐惧与其偏离或矛盾而产生的紧张感。在此基础上,无论质疑“文艺从属政治并为政治服务”,还是反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都理直气壮了许多。解除了心理障碍,再动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有关思想,譬如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的思想,列宁关于社会物质生产是一切社会现象包括政治在内的产生原因和最后根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推论出既然政治和文艺同属上层建筑,因此也就不存在谁从属于谁的结论。否则,一旦政治出现错误,文艺因为从属于政治,那么文艺也会无条件地为之效命,就会成为错误政治的帮凶,“四人帮”时期的阴谋文艺就是例子。无疑,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讨论中,也有从文艺的反映对象和创作规律来论证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为文艺反映的对象是社会生活,政治一般表现为具体的政策

和策略,文艺只能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实施的政治行为,而不可先验地表现某种政治政策和策略,因为这既不符合创作规律,也限制了文艺的反映领域,限制了创作题材,限制了风格,使政治成为唯一标准、唯一可以表现的领域。同样,这种观点,既反对“工具论”、“从属论”,又不是简单地要求脱离政治,还是颇具学理意味的。

除批判“工具论”、“从属论”之外,讨论中还批判了“服务论”,即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命题。一般认为,“服务论”不符合文艺发展的实际,譬如,文艺先于政治而存在,也不会因政治消失而消失,另外在阶级社会里,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都包含着政治内容,因此不存在必须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另外还有比较极端的,认为文艺要离政治远一点。

当然,在这次讨论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在一片质疑和反对声中,还有人为“服务论”辩护。譬如有人从政治在上层建筑中的主导作用,文艺也属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不能直接作用于经济基础,只能通过政治这一中介来达到对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从而得出结论超政治的文艺是不存在的,因此文艺就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有人强调,政治有革命的政治和反动的政治之别,一般地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不对的,由于革命的政治与经济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不能贬斥和否定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即为无产阶级的总的政治事业服务。还有人提醒,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从来都既强调文艺的革命功利作用,又重视文艺的自身特点、规律和文艺与政治的相对独立性,单纯强调哪一点,都是片面的,等等。其实,这种观点是实事求是的、理性的,但遗憾的是在讨论中,中肯之论由于不是“片面的深刻”往往不会受到重视,所以在当时没有得到深入地研究。

这次讨论,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有人试图从界定和扩大政治的内涵开始,譬如提出诸如“人民的政治”、建设也是政治等概念和命题,这在当时还是很有创建性的。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学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政治学不能为文艺理论界提供较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和多元标准,因此以往一般把政治概念,习惯地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而这次政治概念内涵的扩大,意味着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已经开始向学理化方向努力了。而且,对同一的概念能够多元化地理

解,不仅说明眼界的开放,也意味着对多元带来的歧义的宽容。但是,界定和扩大的政治内涵,并没有全面应用到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讨论中,常常还是一面提出政治的概念要宽泛一些,一面又只把阶级斗争作为政治的标识来批判,这样就容易把刚刚取得的学理价值又被自己矛盾的论述消解掉了,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

客观地说,无论从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还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反对“工具论”、“从属论”都是极其必要的。因为在“工具论”和“从属论”中,没有文艺自身的位置,没有起码的对文艺规律、特性的尊重,只有被决定、被要求因此被异化,这对文艺的发展自然是歧途、是灾难。这对解放思想,使文艺走出命定般的被政治所决定、所压制的阴影,促进文艺的繁荣,价值不可低估。但是同样值得肯定的是,在几乎是一面倒的情势下,还有人能清醒地提出超政治的文艺是不存在的,强调对政治也要具体分析,既有革命的政治,也有反动政治,笼统地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是片面的,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等。虽然说,这可能有习惯定势的因素,至少还说明了这些学者是有一定的理论胆气的。因为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大趋势下,事实上,质疑、反对极左政治,已经成为强势话语,由于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这使政治概念本身,都似乎成为不名誉的所指。所以对政治的任何辩解,哪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作为理论根据,也可能招来遮天盖地的指责。

当然,这一切有价值的意见,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还是在政治权威的默许和支持的前提下取得的。这不仅耐人寻味,而且也恰好证明了讨论中曾涉及的问题,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永远都不能忽视。而且,事实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绝不单纯是个学理问题,一向重视意识形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可能不关注到文艺界的讨论,因此,邓小平审时度势,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开幕的“祝词”上,第一次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明确表态,以后不再提“文艺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些传统命题。后来,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说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

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①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并阐释了党中央重新修订的文艺工作的总方针:“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所谓的“二为”方针。

虽然是政治话语,但政治权威的表态还是符合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实际的,而且,在明智的谨慎中,也透露出对讨论中某些笼统否定政治对文艺的正向作用的委婉批评,强调“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其实所谓“服务”,如果不是绝对化理解,它只是文艺功能的结果,并不会对文艺造成干预和强制。另外,如果把“服务”理解成是对作家创作对象的方向性指向的话,对于提高创作价值的自觉性,也不无好处。因为从大的范围讲,文艺创作总是为读者“服务”的,无视读者的创作注定不会取得社会价值,至少是曲高和寡的。人民是文艺的最基本受众,为人民服务,即使不作要求也是作家的努力方向。譬如西方现代派文艺的衰落就在于它们无视受众的接受能力和真实需求。当然,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动机,还有防止文艺创作仅仅耽于作家内心世界的抚摸和自我感觉的表达,而无视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和人民真实需求的意味。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为文艺设置一个最基本的政治要求和社会控制底线。既然作家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度,他就至少应该尽一个社会主义公民的本分,尊重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社会主义的中国。其实任何一种国家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政治底线,他们不会允许作家公然与国家政治唱反调。譬如号称最民主的美国,也不会容忍为制造9·11事件的恐怖分子辩解的文艺作品出版发行。他们可能允许在文艺作品中含糊其辞地讽刺某一个总统,却不会允许其公然污蔑美国国家的形象。况且,新时期后期的文艺创作实践也证明了,那些试图脱离政治的所谓“消解宏大叙事”的“去政治化”写作,贬损的不仅是政治,文艺自身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在学理上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原因。

第二节 讨论对创作影响及对应走势

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无疑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220页。

响,讨论就是解放思想,就是打破禁区,就是还文学创作以自由表现人生的权力。可以说,没有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胆讨论的鼓励,就没有“伤痕文学”的发展,也没有反思文学的勃兴,更不会有那些从民间立场出发的深厚文化底蕴的优秀创作的出现。

如果说,“伤痕文学”还是应政治需求的个体倾诉的话,那么“反思文学”就是它合乎逻辑的发展和深入。而在那些应激状态的情绪平静之后,能够出现诸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程乃珊的《蓝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一大批优秀或比较优秀之作,可以说就是由于文艺与政治的讨论,在理论上,解除了作家们对政治的顾虑,自觉地接受生活的暗示和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结果。因为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主题,如果按照传统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至少应该说是政治性不强,甚至还可能说在政治倾向上有问题。但事实证明,这些作品由于拓宽了生活视野和文学表现领域,它们或以高亢的激情、或是娓娓叙述,或者以深厚的文化内涵,相继进入了准经典的行列。其实,这些作品并没有脱离政治,也没有偏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宗旨。他们站在历史、人民、民族或正义的价值立场,更深入地探索人性、文化的深层结构,在表面荒蛮或平淡的生活中,挖掘真善美,这可能比单纯表现党派政治的作品更有现实的辐射力和历史的穿透性。至少,和反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伤痕文学”摆脱和突破的是极左政治的干扰,但不是脱离政治。准确些说,是借助于正确的政治导向,控诉和颠覆极左政治,先进的政治理念是“伤痕文学”所以取得艺术效果的重要纬度。用张光年在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的话说:伤痕文学“就是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率先以勇敢的不妥协的姿态彻底否定‘文革’文学,是遵奉党和人民之命,积极投身思想解放运动,实现拨乱反正的时代任务的文学”^①。例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王亚明的《神圣的使命》,冯骥才的《啊!》,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尽管在艺术上不是无可挑

^① 张光年:“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在阔步前进”,《人民文学》1985年第1期。

剔,甚至有某些“文革文学”的痕迹,但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反响。这不能完全归结为政治解放或思想启蒙的效果,况且政治解放与思想启蒙也不能与艺术效果完全对立起来,艺术效果本身不可能是单一、纯粹的,它是与包括政治解放和思想启蒙结合才取得的艺术的复合结果。正如文学史上一些经典之作,像《诗经》中的“风”和“小雅”,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以及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不仅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甚至可以说,恰恰是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批判精神,才使它们进入了经典的行列。

后来的“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激愤情绪平静后理性思考的艺术表达,尽管与主流政治话语结合得不如“伤痕文学”紧,这恰好说明文学的目光已经由当下转向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和深刻,由近距离的批判转向追根溯源的揭示。事实证明,这种拉开距离的反思与批判,使文学的社会蕴含和历史理性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和贯彻。其中,对反右扩大化,“右派”们痛苦的人生和传奇经历、“大跃进”假大空“放卫星”造成的全国性灾难和对官僚主义与封建专制关系的艺术探索,是这类创作的主要对象。譬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就是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在极左政治盛行的时代,个人政治品质、官僚主义作风、封建特权思想,很容易借政治大气候实现他卑鄙的目的。作品所刻画的天云山区综合考察队前政委吴遥,就是这样的形象。他因反感于新任政委罗群改变他歧视知识分子的做法,也不能容忍罗群取得他所没有取得的成绩,所以借反右斗争,一举把罗群打成右派,开除出党,并夺走罗群的女友宋薇。作者没有如在“伤痕文学”时期惯常的把批判对象简单化、符号化,拿捏成极左政治的标本,或者把责任推给社会大气候的极左政治路线。作品通过对吴遥这一形象内涵的艺术揭示,不仅使人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系列极左政治观念联系起来,从而对极左路线有了追根溯源的理解,同时,也能领悟到人性中某些黑暗。

在反思文学中,不仅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是艺术反思的对象,普通工人、农民在非正常政治生活中的遭遇也进入一些作家的眼底,这可以说是文学从对精英的反思扩展到对底层的反思的例证,这也是作家已经从“伤痕文学”的应激状态中走出,转向更深沉的“反思文学”的重要标志。譬如高晓生的《李顺大造屋》。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一直执